

杨守敬輿地著述考辨

郝志群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县（今枝城市）人，是我国晚清时期一位获得多方面学术成就的学者。他与輿地、版本、目录、金石诸学均有精深的研究，在经学、小学、辑佚、古钱币等学科也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并都有专著传世。他还擅长书法，被日本人推崇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①，今天流行于日本的“前卫派”书道就是尊杨守敬为宗师的。而其中，他的輿地学成就是最高的，也最为国人所称道。他在世时，罗振玉就曾说：杨守敬的輿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为本朝三绝学”。^②近年，研究杨氏学术者更冠以“地学泰斗”、“历史地理学大师”等称号，这是当之无愧的。

但从目前情况看，研究杨氏輿地学成就的文章大多还只停留在对其几部代表作的评述上。朱士嘉先生《杨守敬地理著述考》^③专文也仅论及杨氏十部輿地学著作，尚不及全部的一半。据统计，在杨守敬八十多种著作中，现知的輿地学就有二十四种。在这二十四种中，十六种已经公开出版，四种以稿本、钞本形式流传，另有四种只知书名，不详存佚。这些著作按其内容又可细分为历史地图、山川地理、正史地理志、地方志、地理文集、地理译著六大类。本文拟按类对杨守敬的輿地著述作一较全

面的考辨，疏漏之处，尚乞教正。

一、历史地图的编绘

编绘历史地图，杨守敬舆地学研究的开端。在杨守敬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二十岁条就记载，他曾借余杭郑兰所藏六严《舆地图》影绘二部，由于逼真，受到郑兰的“激赏”。从此以后，杨守敬一方面注意收藏历代舆图^④，一方面亲自编绘出版历史地图。现知的杨守敬编绘出版的历史地图有以下三种：

（一）《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六十七幅，光绪五年（1879）东湖饶氏刻本，一册。这部地图集是光绪四年，东湖（今宜昌市）士绅饶敦秩邀请杨守敬共同编绘完成的。杨守敬《年谱》三十八岁条有载。只不过杨氏将此事误记于光绪二年，而以往有关的研究文章亦多沿袭杨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饶氏跋文中记载：“去岁，……（守敬）出旧稿一帙，云系十年前与归善邓君承修所同撰者。”光绪三十二年（1906）重订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杨氏自序亦云：

“四十年前，余在京师，与归善邓鸿臚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光绪戊寅，复与东湖饶君敦秩增编而刊之”。饶跋中的“去岁”，指光绪四年，由此上推十年，正值同治七年（1868）。核之《年谱》，此时杨守敬正寓居京师邓承修家，至夏季，“闻祖父老病”，才束装归返宜都老家。则他与邓承修合作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当编绘于同治七年的上半年，这部图集是目前已知的杨氏舆地著作中的最早的一部。据饶氏跋文载：其中自正史而外，有历代割据及十六国等图，较江阴六氏《沿革图》为翔实，而梁、陈、周、齐四代乃缺焉。余以为此不可不补之也，乃延傭吾至余家，与之钩稽排比而成之，又推广于东晋、东西魏、五代、宋（南渡）及历代四裔诸图，合之前稿，共得六十七篇。”

拿这段话与六十七图之名相核对，则杨、邓所绘之图当不会少于四十幅，确实比六严二十二幅的《历代地志沿革图》要翔实的多。治輿地先从治輿图开始，按图索骥，条缕沿革，这无疑为杨守敬以后登上輿地学研究的顶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仍不能不叹为高明之举。

（二）《历代輿地全图》，又称《历代輿地详图》或《历代輿地图》，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杨氏观海堂刊本，三十四册。全图集分成四十五个图组，有图一千九百二十八幅。各图均以《大清一统輿图》为基础底图，朱墨二色套印，朱红色表示今地名和今河流，墨黑色表示古地名和古河流，古今对照，上下贯通，使读者一目了然，是我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大型历史地图集。

应该说明的是，这部图集的每一图组因刊印时间不同，在配套出售的同时，都曾单册发售过。致使国内各主要图书馆的著录多有不同，或录全图，或录单册，客观上造成了一定混乱。

（三）《水经注图》四十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观海堂刊本，八册。该图仍以《大清一统輿图》为底图，朱墨套印，朱今墨古。并依《水经注》目录顺序，每水绘一图。四十卷后另补绘滏水、洛水等二十八水图，合之一共有三百零五幅图。该图在记叙各条水道的同时，对这些水道流经的州县城邑、名胜古迹、湖泽等也都作了较精确的标绘，一切“皆循酈氏步趋，必一一证合，以书考图，以图复书，无不吻合，而流移变动如指诸掌”。⑤

虽然该图是为《水经注》而作，但与杨守敬另一部輿地巨著《水经注疏》并非毫无关联，事实上杨氏正是因为撰著《水经注疏》的需要，才“复为图以经纬之”⑥的，图与疏不但可以互证，而且相得益彰，诚为杨守敬輿地学研究的两部不朽之作。

二、《水经注疏》及其他山川地理论著的撰述

山川地理是中国沿革地理的一大分支，其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代有名作，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但《水经注》自问世以后，传抄翻刻，散佚错讹之处颇多，尤其是经注混淆难辨，已失当初酈书原貌。早在明代，即有吴琯、朱谋玮等为之校刊、笺正，惜未臻精确。至清代，治《水经注》者，前有顾炎武、黄宗羲、顾祖禹等倡先，后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并起，廓清经注，补齐脱佚，各成专书，被誉为“酈氏功臣”。但诸家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⑦，“间有酈氏不误，诸家改订反误者”。^⑧于是杨守敬与门人熊会贞乃发愤撰述《水经注疏》，“凡酈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⑨而且“举全、赵、戴诸家谬误，摧陷廓清，无所于让”。^⑩使《水经注疏》成为有明以来酈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杨守敬与地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为了撰述《水经注疏》的需要，杨守敬还对诸如《水经注》“赵戴之争”、《水经注》所引书目、《禹贡》山川地理等问题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并各有专书传世。

（一）《水经注疏》四十卷，杨守敬、熊会贞同撰。这部著作从开始撰述到完整地出版，历经近一个世纪。其间稿经数易，人经数手，情况颇为复杂。单就版本而言，现存的就有两种全稿（钞）本（均有影印本）、三种残稿（钞）本（其中一种有影印本）和二种排印本。

全稿本之一，即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之本，“全稿原装一卷一册，计四十卷，共四十册”。^⑪是当年熊会贞请武昌藏书家徐恕（字行可）录副的一部钞本，1954年由徐氏转卖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将全稿影印出版，线装成二十册，另附残稿影印本一册。这是《水经注疏》全书第一次公开

面世。

另一部全稿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原稿为红格二十四开手写本，共线装四十一册”。^⑩1971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题名《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平装成十八巨册。

残稿本的第一种，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稿为钞本，阙卷二十七、卷二十八两卷。1982年出版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载录。此当即陈桥驿教授在本日所见之本。

残稿本的第二种，现藏重庆市图书馆。原稿仅存卷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册。半叶九大行，每大行又被分成两小行，行二十格，无鱼尾。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二首叶钤有“李子奎珍藏”阳文印章。这个本子是1984年9月，我同湖北人民出版社王永瑞先生在调查杨守敬著作情况过程中访求到的，与之同时发现的尚有杨氏其他著作手稿多种。

残稿本的最后一种，即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并作为科学出版社全稿影印本附册的那一种。这是一部朱栏粗格式样的本子，“是准备雕板的底稿”^⑪，惜仅存卷八《济水注》一册。

两种排印本，一种是1949年12月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水经注疏》。这个排印本是经李子魁之手编排出版的，全书仅收入《河水注》三卷，一册。

另一种排印本即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的《水经注疏》四十卷本。这是最新的一种《水经注疏》版本，也是目前最好的一种本子。

依照《年谱》记载，《水经注疏》初成时，杨守敬已六十六岁，他深恐易世之后，书稿为他人所得，也增一“赵戴之争”。于是“既《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⑫，先刊成了《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光绪三十一年观海堂刊本，六册）。这实际上是《水经注疏》的一个简本，节录的内容“大抵考古者为多，以实

证无可假借也；其脉水者为略，以文繁非全书不明也。”^⑮其用心之良苦，对《水经注疏》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其后，因《要删》错误较多，疏文续有所得，于宣统元年又续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四十卷，六册。

另外还有一部《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四十卷，稿本，册数不详。这部稿子在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中曾提及，并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即今“中国版本图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关于此书的稿本，在《胡适手稿》中也有记载：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了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胡适这里也称这部稿子为“稿本”，并且是“收买”的。但未说明是买自何人。

后来1989年，我在湖北省图书馆查书时，偶然找到一部近人枝江张继煦（号春霆）的钞本，十五册。书前有张氏的一段跋文，云：“（民国）二十六年，余向熊小固（熊会贞之子——引者按）假是书逐录一通，存之篋行。”则当时熊小固手中必还有一部，而且此时距熊会贞逝世仅相隔一年，熊小固手中的这部稿子就是该书之稿本，当不会有问题。至于熊小固手中的稿本与胡适所见之“稿本”、贺昌群所说之“稿本”之间有何渊源关系，亦或就是同一部稿本，有待进一步探寻。

对于《要删》及《补遗》、《续补》、《再续补》之价值，熊会贞在《关于水经注之通信》中早就明确说过：“若《水经注疏》告竣，则《要删》等可废也”。^⑯故此处上述四部《要删》都不单独计数，而与《水经注疏》合计为一种。

（二）《水经注疏要删引用书目》四十卷，稿本，三册，现藏重庆市图书馆。但不知何故，《水经注疏要删》刊本中未予收

人。

(三)《水经注引用书目》四十卷，稿本，册数不详。周贞亮、李之鼎编《书目举要》（1920年刊本）载录，并注明“原稿存宜秋馆”。按“宜秋馆”系李之鼎之书斋名。1914年，李氏曾谒杨守敬于上海，并将杨氏《丛书举要》二十卷稿本扩编刊成六十卷本，1918年又刊成《增订丛书举要》八十卷本。据熊会贞在《年谱》中记载，杨、李虽年龄相差很多，但却“一见莫逆”，所以此稿存于李氏手中是不足为怪的，可惜今不知散于何处。这个《书目》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凡例》（原载《水经注疏要删》卷首）中也曾提到过，并说要“冠于书首”，估计是准备放在以后《水经注疏》刊本的卷首，因为《水经注疏要删》刊本前并没有收入此《书目》。岂知今日已不详存佚，这恐怕是杨守敬当年始料不及的。

(四)《水经注戴赵合校勘本》不分卷，稿本，一册，现藏重庆图书馆。原稿仅有戴、赵本《水经注》卷二十六胶水、潍水、汶水的校勘文字，而卷首有杨氏序文，或杨守敬仅只校勘了此三水，已不得而知。

(五)《三毫考》不分卷，原文附于杨守敬经学著作《论语事实录》后，两部著作前均无刊刻年月。据《年谱》三十一岁（同治八年，1869）条载：“为《论语事实录》成，刻之。”未提刻《三毫考》事，这给判定《三毫考》的刊刻时间带来了一定难度，好在李慈铭的《桃花圣解庵日记》^⑦里对此提供了一条很有力的证据。《日记》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记道：“惺吾以早年所著《论语事实录》、《三毫考》相质。”此处“相质”是“赠之质正”之意，而杨守敬是不可能以手稿赠与他人质正的，所以，李氏所记之《三毫考》肯定是已刊刻的本子，而且是与《论语事实录》合刻之本。之所以这样说：一是《论语事实录》和《三毫考》至今只有一种合刊本，未发现其他单刻本；

二是《三毫考》就其字数而言，仅有1700余字，以如此少之字数是不可能单独刊刻成册的。那么，既然依据《年谱》，知道《论语事实录》刊刻于同治八年，则与之合刻的《三毫考》也当刻于是年。虽然准确地说，《三毫考》只不过是一篇輿地考证文章，但它是现知的杨氏最早面世的輿地学论著，其发轫之意义也是不应忽略的。

（六）《禹贡本义》不分卷，光绪三十二年杨氏刊本，一册。^⑧

（七）《湖北江汉水利议》一篇，原文曾登载在湖北师范学院所编《史地丛刊》1947年第2、3期合刊上。未署写作时间，但文中有“别详《禹贡本义》”句，当写于《禹贡本义》刊成之后。故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将此文编于光绪三十四年杨守敬七十岁条下。该文稿本也已找到，将收入《杨守敬集》。

三、对正史地理志的补正

由于编绘《历代輿地图》和撰述《水经注疏》的需要，杨守敬对我国历代正史《地理志》大多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考证，尤其是唐以前的《地理志》，考订、补缺更是不遗余力，并各有专著传世。

（一）《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一册。^⑨

（二）《读汉志释例》一卷，未刊。杨守敬《前汉地理志图》自序云：“别为《释例》一卷，为读班《志》者发其凡。”但不知何故，该图中未收此《释例》。此书在杨氏其它论著中亦多次提及，且名称互有差异：《禹贡本义·又过降水》作“《汉志释例》”；《晦明轩稿·汉志阳山阴考》作“《读汉志例》”，同书《清水考》又作“《读汉志释例》”《水经注疏要删》卷二十漾水作“《读汉志释例》”（《水经注疏》卷二十删去此条按语），当系同书而名异。稿本今不详存佚。

(三) 《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光绪三十三年刊本，四册。^{②①}

(四) 《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附《刘宋州郡图》前。自序云：“国朝扬州成君孺为《校勘记》，多所是正。余尝复审之，犹有遗漏，别为《札记》附后。”则此为杨氏对《宋书·州郡志》所作的校记。

(五) 《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杨守敬校补，谭其骥复校，刊载于《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七期上。据文前谭其骥跋记可知，此为杨氏在读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记时写在眉端的批语，后由徐行可迻录成文，经谭其骥复校发表。一共指出成书错误二十处。

(六) 《北魏地形志札记》，附《北魏地形志图》前。自序云：“北魏《地形志》貌似高简，然有略所不当略，而详所不当详者。……又况自宋以来，版本阙误，识者病焉。既嘱熊君会贞为图，并校补《札记》于左。”

(七) 《西魏书地域考补正》，附《西魏疆域图》前。自序云：“魏收作《魏书》于北齐，时不载西魏事，盖外之也。国朝谢启昆因作《西魏书》以补之，而于地理甚为疏陋。……乃嘱门人熊君会贞详加考正，作为此图，余复为之校定，札记于左。”

(八) 《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六册。对《隋书地理志》的考证，杨守敬早年即已着手，并花费了许多心血，在此刊本后，有杨氏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写的一篇后记，云：“余少壮之年，有志斯学，……溯自草创之初，迄今缮写之日，稿凡五易，时阅卅年。”但这个本子刊出后，杨守敬却很不满意，于是又“复发图籍比勘之，增删几万言，其可铲除者更换之，不能挤入者别为补遗于后。”^{②②}最后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刊成第三次重改本，题名《重订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附补遗，六册。

四、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和对古地志的辑佚

杨守敬一生中，曾先后受聘参加过（光绪）《荆州府志》、（光绪）《黄州府志》、（光绪）《湖北通志》和（宣统至民国）《湖北通志》的编撰监修工作，其中除《黄州府志》未发现有文字稿外，其它都有手稿或刊本传世。对于古地志，杨守敬也十分重视，他曾仿效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成《辑古地志》一书，而且不论是从资料，还是体例上，都较王书更加完备。应该说，杨守敬对地方志的编纂及对古地志的辑佚是他舆地学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荆州府志·舆地志》，残稿本，三册。现藏湖北省图书馆。据《年谱》三十九岁条载，1877年，荆州知府倪文蔚续修府志，延请杨守敬为“编纂”，此稿当即写于此时。残稿“都是些单篇文章，多数文章有底稿和誊写稿之分。……还有部分属于资料汇编，资料后面注明了出处。”^②

（二）《湖北通志·舆地志》，残稿本，十二册，现藏湖北省图书馆。“原稿为红格子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书口上下有象鼻鱼尾”。^③这部稿子原本是为（光绪）《湖北通志》而写的，后因总纂湖北巡抚彭祖贤病歿，《通志》辍修而搁置，此点在《年谱》四十七岁条记之甚详。宣统二年（1910），湖北通志局重开，又延请杨守敬及门人熊会贞为“协纂”^④，继续主持《舆地志》的修撰工作。但次年，由于辛亥革命爆发，通志局再度关闭，至民国三年复开，而此时杨守敬已受聘赴京，第二年即在京溘然长逝，估计赓续之工作当是由熊会贞完成的。以此稿本之内容与（宣统至民国）《湖北通志·舆地志》之内容相对勘，发现“沿革”、“山川”、“形胜”、“古迹”依系稿本增补而成。但“藩封”、“风俗”、“物产”三部分在原稿中未见，当非杨氏所修。“据江夏周以存《钱季香先生

家传》云，乃钱桂笙所纂修。”^②。

(三)《湖北通志·金石志》，硃印本，十四册。原稿底本今藏湖北省图书馆。该《金石志》原本也是为（光绪）《湖北通志》而作，并且当时已刻版，因《通志》辍修，遂刷印若干部硃印本传世。后来修（宣统至民国）《湖北通志》时，即据此硃印本稍作修改，而作为该《通志》之《金石志》。其内容虽与輿地无关，但系方志体，故列此。

(四)《辑古地志》三十二卷，未刊。此书最早载见于《年谱》七十二岁（宣统二年）条，且云：“未写定”，当是正在謄录之中。因为第二年，在全部出齐的《历代地輿全图》前附有《观海堂地理书目》，其中已载“《古地志》辑本十二册，未刊”。《古地志》辑本与《辑古地志》显系一书。这说明到宣统三年，此书已抄录完成。惜未梓行。稿本今不详存佚。

五、《晦明轩稿》的出版与《晦明轩续稿》的补作

杨守敬一生著作甚丰，散篇题跋亦为数不少。但其文集已出版者，仅有《晦明轩稿》一部，且版刻迁延，颇为复杂。另有一部《晦明轩续稿》，盖由其后人汇编而成，稿本今不详存佚。

(一)《晦明轩稿》不分卷，二册。卷首牌记题“光绪辛丑九月雕于邻苏园”，并有杨氏光绪辛丑（二十七年九月）自序，文曰：“輿地之学古有所受，自《尚书》今古文家言已不能强同，然每树一义，各有依据。……余寻绎有年，颇有异同，其所辨驳，大抵当世魁硕。”揣其文意，此书显为杨氏考证輿地之集。翻检原书，首册共收文三十篇，除五篇书跋外，其余二十五篇均为輿地考证文章，与原书旨尚合。《宜都杨氏观海堂书目》对该书所作的介绍说：“首册论地理，为两湖书院教习稿。”当属可信。但有一点却很奇怪，即五篇书跋之一的《新刊妇人良方补遗大全》残本，文后署明的写成时间是“宣统庚戌四月”（二年），

较之此书牌记所题光绪辛丑（二十七年）已整整晚了十年。而检查该跋之页码，却与前后文页码连贯一致，令人费解。二册的情况则更加令人迷惑，前十五篇文章，不但没有一篇是舆地考证之作，而且书口处有的刻“晦明轩稿”，有的则刻“晦鸣轩稿”，还有的直接刻上该文名称，如《汉书古注辑存序》等。前十三篇文章页码是连贯一律的，而最后两篇，一篇自成页码（一至四），一篇则干脆没刻页码。这十五篇文章中最晚的一篇写于宣统二年四月七日。第十五篇文章之后则附有另外三种金石著作，即《壬癸金石跋》、《丁戊金石跋》和《己庚金石跋》。三种著作共收金石跋文三十八篇，其中最晚写成的一篇当系《己庚金石跋》之《跋刘聚卿所藏旧拓天发神讖碑》文，原跋虽未署年月日，但《己庚金石跋》仅有此文，其作于宣统元年（己酉）或二年（庚戌），当无问题。

从上述情况分析看，上、下册的《晦明轩稿》肯定不是成于一时，而是自光绪二十七年开雕，随写随刻，随刻随印，经过了整整十年，至宣统二年才终告厥成。其间，杨氏是否随印随售，现在情况尚不清楚。杨氏自序曾云：“拟俟之身后，有爱我者，或为传录。而新化邹君沅帆、丹徒陈君善馥怱怱不已，乃理旧稿，付之梓人。”可见，当初付梓时，杨氏还是有所顾虑的，这或许就是此书刊刻时间如此之长，内容庞杂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样，从杨氏本人及后人都是将该书算作他的舆地著作的。

（二）《晦明轩续稿》十卷，未刊。此书仅见于李之鼎《增订丛书举要》卷六十四“观海堂所著书”一处载录，并被列入“未成”之书。但观其所列其他“未成”之书，如《书学述言》、《评碑记》，《评帖记》均有稿本传世。^②而在《唐宋类书引用书目》下，李氏更自注云：“稿本在鼎处，嗣补辑续刊。”可证李氏所谓“未成”乃“未成定稿”之意。该书未定稿今不详存佚，其书内容亦不明，以其系《晦明轩稿》之续作，估列此，以

俟查证。

六、翻译日著《支那地志》

1880年4月至1884年4月，杨守敬曾作为清朝驻日公使的随员，在日本整整留居五年。其间，他与日本文化界交往甚密，当时日本的著名文人岩谷修、日下部东作、冈千仞等，都曾问学于他，也都为他搜书、刻书提供过方便。在这些交往中，也奠定了他的日文基础。回国后，杨守敬仍然重视日文的学习，他曾请他的日本学生水野疏梅为其两孙先梅、先桔讲授日文，即可见一斑。而《支那地志摘译》则是他八十多种著作中唯一的一部译著。

《支那地志摘译》（蒙古之部），不分卷，钞本，二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原钞本前无序，后无跋。据查是书是以日本参谋本部1893年编辑出版的《支那地志》卷十五下“蒙古部”为底本译出的，分成上、下二编。上编内容包括沙漠、气候、物产、风俗、政体、宗教、岁出入、教育、兵制等九项；下编内容则有制造、贸易、区分（幅员、人口）、道路、电信、通货、都府等七项。这部译稿在杨氏《年谱》和其他著作中均未提及，译成的时间书中亦无明确记载。

杨守敬除了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学术价值极高的舆地专著外，他对历代舆地著作的题跋亦为数不少^②，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在论及了。

注：

①郭子绪《日本书法篆刻选·简介》第9页。

②⑤《邻苏老人年谱》六十七岁条。

③载《禹贡》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④仅《杨惺吾藏书清册》（稿本）及何澄一《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中就载录杨氏藏历代舆地图近二十种。

⑥杨守敬《水经注图序》。

⑦⑨⑭⑮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序》。

⑧⑯《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⑩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573页。

⑪⑬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⑫《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稿本提要》，见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

⑰《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

⑱见《越缦堂日记》第二十一册。

⑲⑳㉑参见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一册。

㉒杨守敬《重订隋书地理志考证序》。

㉓见徐孝宓、刘昌润主编《湖北省地方志考略·荆州府志考略》。

㉔㉕见《湖北省地方志考略·湖北通志十书考略》。

㉖民国十年版《湖北通志·纂校姓氏表》。

㉗三书稿本均藏湖北省博物馆。

㉘这些题跋大多收入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及《日本访书志补》。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